

北京孩子

六七十年代的 集体自传

刘仰东◎著

顽主
从合作社到百货公司
课外活动
“老狼老狼几点了”
臂章替代了红领巾
“复课闹革命”以后在游行行列
“拍婆子”
“掏裆”时代
骑驴砸骆驼
跳皮筋
“毒草”还在泛滥
小人书之旅
昨天的时尚
学生头及其变种
军装
苦加

中国青年出版社

I251/128

2009

北京孩子

六七十年代的 集体自传

刘仰东◎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孩子：六七十年代的集体自传/刘仰东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06-8573-9

I. 北...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2176号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 址：www.cyp.com.cn

编辑电话：(010) 64034329

责任编辑：林 栋

网 址：LinDong2002@sohu.com

营 销：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010) 64017809

印 刷：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9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09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册

定 价：3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35821

原版序

北京孩子没多大出息。

多年前，听说有个作家接受采访，被问到大学里北京同学与外地同学的异同。他答，毕业后，若北京同学和外地同学分到一个单位，不出几年，外地同学一定是北京同学的上司。作家以观察社会为己任，他的“观察”大体不错。不论挖沟要饭做小买卖，还是升官发财干大事业，北京的孩子都不行，不如外地过来的孩子，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说得婉转点，北京孩子较少“于连性格”，说得直白点，是北京孩子散淡，缺乏进取精神，不经折腾，以至于多不成大器。不独作家，一些学者也就此下手，著书立说，对作家的观察所得进行刨根问底的分析，甚至追溯到了清朝，把它归咎于“八旗遗风”。

北京孩子是不行，但再怎么不行，所幸还有一点可吃的老本。那个年代的很多事情，孩子无论外地的北京的，都经历过；但还有很多事情，外地孩子只是听说和向往，无缘亲历，它们属于北京孩子独占并赏玩不尽的收藏品。

中国有句俗语，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北京孩子既然普遍没什么出息，难充好汉，因此也不必有不遵古训之虞。倒是另一个叫余华的作家，在他的文章里几次提到古罗马时期有个叫马提亚尔的诗人的话——“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可以拿来当做北京孩子叹气之余，聊以自慰的招牌。

因为世道变得快，怀旧已从一种心态升格为一种生活方式。几年前，有一家电视台公布了一项网上民意调查，它显示，在“十大时尚生活方式”的排名榜上，怀旧列在了头一位。这也意味着，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那些淡而无味的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分量，越来越有滋味，越来越有意思和有意义了。

谁不想再活一次呢？

目录 | CONTENTS

序：“红底金字”年代的北京孩子（李乔）

原版序

一幅鸟瞰图

北京孩子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 1

“复课闹革命”以后

“北京孩子”走势 — 13 穿越当年的校园 — 13

小学时代 — 19

臂章替代了红领巾 — 19 课本：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 20

千篇一律的教室 — 22 帆布书包 — 24 低年级和高年级 — 25

中学时代 — 26

改校名 — 26 斗校长 — 27 变，再变 — 28

给同学分拨 — 32 无“恶”不做 — 36

操场 — 38

课外活动

车内一景 — 41 在游行行列里 — 42 扫墓、游园、参观 — 46

组字：说不出的滋味 — 51 迎宾 — 52

拉练与军训——开门办学之一 — 54

学工与学农——开门办学之二 — 57

小学生：象征性活动 — 58 中学学工纪事 — 58 中学学农纪事 — 63

玩

时代背景 — 69

收藏加赌博类 — 74

烟盒 — 74 冰棍棍 — 78 瓷片、铁片、奶瓶盖 — 79

糖纸、剪纸 — 79 弹球 — 81

群体类 — 83

骑驴砸骆驼 — 84 攻城 — 85 打皇帝 — 86 踢罐 — 87

双球打垒 — 88 官兵捉贼 — 88

	一组集体游戏 — 90
“老狼老狼几点了”	“摸瞎子”
	“一网不捞鱼”
	“我们要求一个人”
	器械类 — 93
放毒气弹 — 93	埋地雷 — 94
	打绷弓仗 — 94
	冰车大战 — 96
	跳皮筋 — 97
	沙包三玩 — 100
	粘蜻蜓 — 101
	打嘎、抽“汉奸” — 103
	抓拐 — 104
	另归一类 — 104
养热带鱼 — 104	养蚕 — 106
	遛车 — 108
	玩“坏” — 111

精神食粮

	啊，电影 — 119
	“天堂” — 119
	看过 N 遍的片子 — 124
	生活中的电影“含量” — 128
	看电影奇遇记 — 135
	小人书之旅 — 138
	[附]回到“小人书”时代（姜维朴的记忆） — 143
	字书——一个即将消逝的概念 — 147
“毒草”还在泛滥 — 147	黄新原的读书生活 — 149
	手抄本 — 151
	窗外事 — 151
	《水浒》情结 — 153
	[附]鲁智深岂能再遁空门（邢东田） — 154
	小说之外 — 156
	[附]王府井书店的一天——1978 年“五一”纪事 — 158

三大运动

	乒乓球 — 162
天下第一“球” — 162	都是球迷 — 165
	都是追星族 — 167
	自行车 — 168
	“掏裆”时代 — 169
	“战车”时代 — 170
拔座、换锁、卸架子 — 171	锰钢车、外国车——都是展品 — 172
	遇罗克他们的香山之行 — 173
	和警察打交道 — 174
	游泳 — 175
	游泳池——孩子的仲夏之梦 — 176
	“会游了”之后 — 177
	两种游泳衣裤 — 178
	水中绝活 — 179
	另一类绝活 — 181

日常生活（一）

	家庭调查 — 182
	两种生存要素 — 182
	居住环境 — 184
	家当 — 187
	家务活 — 188
	家务活之一——倒炉灰 — 188
	家务活之二——洗衣服 — 189
	家务活之三——收拾屋子 — 190
	家务活之四——做饭 — 191

大采购 — 193

从合作社到百货公司 — 193 粮食 — 194 油盐酱醋 — 197

咸菜豆腐 — 198 鱼肉禽蛋 — 199 蔬菜 — 201 水果 — 205

年货 — 208

零食 — 211

冰棍 — 211 糖 — 213 点心 — 215

日常生活 (二)

浴池 — 217

淋浴和盆塘 — 217 洗澡：被归于“文化娱乐”的重大活动 — 219

公共浴池见闻 — 220 单位浴池见闻 — 223

理发馆 — 224

一到八级 — 224 学生头及其变种 — 227 理发馆外的理发 — 228

照相馆 — 229

“中国”与“大北” — 230 如此照相 — 233 橱窗陈列的名人 — 235

昨天的时尚

穿戴 — 237

栽绒帽子、军帽 — 238 “板儿绿”、制服、口罩带 — 240

“白边儿懒”、回力、五眼棉鞋 — 243

毛线帽、拉毛围脖、蓬松发式 — 246

军装、花格外套、假领子、肥裆裤 — 247

襪鞋、猪皮鞋、塑料凉鞋 — 250

打群架 — 251

挂架 — 251 [附]刀光灿烂的日子(李乔) — 253

顽主 — 255 战例(一) — 258 战例(二) — 259

享受一二三 — 261

孩子“烟民” — 261 酒量是这样练出来的 — 265

从莫斯科餐厅到小吃店 — 272 “拍婆子” — 278

当年的段子 — 282

后记

一幅鸟瞰图

北京孩子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和今天比，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还是一座安详、清静、古典和缺少变化的城市。也可以说，是另一个样子。

王朔在小说《看上去很美》中，对西长安街西边的复兴路沿线，作了这样的描述：

很多年前新北京一带还是典型的郊区景致。天空还没有被首都钢铁公司和八宝山火葬场污染。也不繁盛，没有沿街那些花狸狐骚的大笨楼和脏馆子。复兴路只是一条四车道的窄马路。两侧树木葱茏，有很宽的灌木带将非机动车道隔开。骑自行车或步行的人可一路受着林荫的遮蔽。随处可见菜田、果园、远山与河流。建筑物大都隐在围墙深处，多数高度在二层或四层，在林木环抱中露出错落有致的屋顶。仅有的标志性建筑是军事博物馆高大的金五星和海军办公的大屋顶黄楼。

1955 年建成的“全总”办公楼。这是它爆破前一个月的样子，“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牌匾早已摘去，多数窗户也被拆除。



沿着王朔说的地段向东，渐有城市气象。过了木樨地，路南是“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的办公楼，它的大门上方挂着毛泽东题写的红底金字的横匾，能让有心人觉得与众不同。2003年9月9日凌晨，这座有四十八年历史的九层灰色砖结构建筑被人工爆破，眨眼间化为乌有。当日上午，一位网友在帖子里写道：

这是一座和童年的记忆紧密联系的大楼。1960年至1966年，我们就在大楼南边的小学里（应该是复兴路小学，即今天的白云路小学——引者）读书，下学后偶尔放纵一把，在胆大同学的带领下，到大楼里坐电梯，上上下下几个来回，着实过了几把瘾。四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总”大楼渐渐湮没在拔地而起的高层楼群中。可是当年，不仅是附近地区，即使在整个北京市，它也称得上一座鹤立鸡群的建筑，站在它的顶层，几乎可以俯瞰半个北京城。周围的孩子比着数十大建筑，常拿它充数。这座大楼爆破前一个月，它的同龄人祝东平教授和我一道来这里拍了几张照片，正巧碰见中学教过东平，如今已从“全总”机关退休并住在“全总”大楼隔壁一栋宿舍楼里的唐老师。唐老师说，50年代她上小学的时候，周围还是一片农田菜地，就有这座楼了。她还说，拆掉这座楼，不少“全总”的老人难以释怀，拆还是不拆，是有争议的。本来早就该爆破了，一直拖着，是为了让来开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再看一眼。言语间含着惜别之情。

从这里再向东，坐1路公共汽车（当年通称“大1路”）走三四站地，过了天安门，即进入东长安街。已故的学者邓云乡解放初期在燃料工业部工作，四十年后，他回忆说：

从南河沿、南池子南口对面说起，先是公安部北墙外盖起的一座三层楼，

北京十大建筑之一——民族文化宫



人叫“宋得贵大楼”，因为主持基建的是一个名宋得贵的干部，“三反”时因盖楼贪污被处决了。玉河桥东面直到邻近东单，这一大片长条地带，分给四个部盖办公大楼，由西往东，依次是纺织部、燃料工业部（后分煤、电、油三部）、劳动部、对外贸易部，后来这些部在“三反”前后，依次盖起了大楼，只有劳动部，虽然分到了王府井、长安街十字路口东南角那样重要的一块地皮，据说因为没有经费，一直闲置了许多年……当时我正在燃料部工作，参与建楼工作。初建主楼连地下五层，两翼四层，煤炭部时期，又加了两层，现在好像是国家旅游局……北京饭店西面五十年代所盖新楼，是1953年初开工的，当时我还在北京，办公室隔马路斜对其工地，常常过去看看，没有打桩，用的是沉箱法。

这些三到五层高的“大楼”，就是解放初期，耸立在从天安门到东单沿途——北京市最核心也最热闹的地段——的建筑物。后来，尽管这些办公楼里的机构或机构的名称换来换去，而情景依然，直至六七十年代。

那时的北京，三四层高的楼房，即可享“大楼”之誉。大学毕业时，一位同学在通讯录上留下的地址是：朝阳区左家庄二区大楼二单元六号。我去过他家，是一幢建于50年代的四层红砖坡顶宿舍楼。多数机关、学校、部队院子里的主楼以及有名的饭店，也都在四五层上下，十层以上的建筑，还属于北京人心态上的一种期望，十大建筑之外，大概仅京西宾馆而已。那时，除了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和由董必武题名、70年代中期营业的西单百货商场，顾客逛闹市区的大商店（如东风市场、人民市场、西单商场），是用不着爬楼梯的；如今已不可或缺的滚动电梯，当年除了北京火车站和少数地铁车站，别处见不到；而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自动玻璃门，首次亮相是在北京饭店新楼建成的1973年，这座标志性饭店的栅栏外面，经常围着来逛王府井的外地人，翘首巴望客人出入，以观自动门“表演”。

1968年的冬春之交，北京市启动了一场“改头换面”的轰轰烈烈的城市工程——拆城墙。此前，除德胜门、崇文门和西直门外，今天的地铁环线路上的十来个城门楼，自50年代起陆续被拆除，但城墙大体还在。当时不过十来岁的汪明，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5号，与城墙隔窗而望。她经常陪父亲汪曾祺遛城墙，三十年后，也留下了儿时的记忆：

其实城墙上并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就是一幅凄凉败落的景象。城楼残破不堪，彩漆差不多都剥落光了，木头柱子裂着一条条大口子，满是尘土的木楼梯也都糟朽了。爸愿意走进城楼里东看看西看看，在有字画的地方多呆上一会儿。

有时一高兴，在里面大声叫喊，惊得蝙蝠噤里啪啦地乱飞一气，空阔的城楼里充满了神秘的回声。

城墙上黄土裸露，刮风时会迷了眼睛；一丛丛的衰草，七零八落的烂砖，好多砖头的下面压着风干了的屎。城墙上冷冷清清，屈指可数那么几个人。有人放羊，有人放风筝，有人挖野菜，也有人聊天。

拆城墙，是一场跨时不过数月的“摧枯拉朽”的“战斗”，但它的冲击波，迄今未息。1950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对利用城墙规划这座古城作了理想化的设计：“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息。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以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接近二十年后，这个美妙的设想的幻灭，给了梁思成沉重的一击，据他的夫人回忆，梁听说城墙被拆时，“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至今，拆城墙，仍是一件让不知多少持文物保护态度的北京市民耿耿于怀的事情。但也有另一种声音，邓云乡就说过这样不合潮流但不一定没有道理的话：“北京拆城墙时，不少人有意见，据闻梁思成先生还为此坠泪，其实拆了也就拆了，你坠泪又有何用。正像黛玉姑娘笑宝钗姑娘一样，哭出了两缸眼泪，也医不好棒疮——况且陵谷变迁，本是历史之常，阿房未央，今又何在？即以北京说，辽、金析津旧城，元代大都现在又剩下多少呢？所以城也好，阙也好，是不会永远存在的。”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拆城墙，是一项难得一遇的能让市民体会到“变化”的快感的城市工程。马车车队运土运砖的壮观场面，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据说拆城墙的时候，挖出不少解放前夕埋进去的金银条、元宝、子弹及各种型号的手枪。和我曾多年同事的沈小农，当年不过十五六岁，是北大附中老初一的学生，家在雅宝路一带。有一阵子他每天烙两张麻酱饼，拉上同院的一个孩子，一人一张，揣在裤兜里，带上钳子，然后顶着寒风，直奔城墙废墟，从建国门扫到老前门火车站，寻找铜丝之类可以卖破烂的东西，一翻腾就是一天。后来居然有了十几块钱的“战果”——这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饱餐一个月的伙食费。他还记得用这笔钱买了佐餐葡萄酒、粉肠、猪头肉，取代烙饼，“大吃”了一顿。那时人无论大小，见到或想到钱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字——吃。

城墙拆了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城里”和“城外”的概念还沿用着，护城河还留着。就孩子而言，冬天确可滑冰，夏天虽不见放舟，却可以捞鱼虫、

游泳。河水不深，但每年都能听到淹死人的悲讯。

1974年10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兴门立交桥竣工，今天的读者还可以在桥体上找到刻着施工单位和竣工时间的标志。此前，北京市区没有立交桥和高架桥；没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没有二环路（1977年7月7日，二环路象来街至月坛南街一段率先通车），更不用说三、四、五环路了。今天的三环路以外，几乎都是菜地或农田，属于某个公社所辖。城里的马路大多为四车道，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二车道的，不少马路的两侧或中央有排水沟。那时没有主、辅路之分，多数马路上的汽车道和自行车道没有被隔开，马路中央没有隔离栅栏。人行横道也不似今天的斑马线而是两条虚线，大多形同虚设，因为市民往往视而不见，就顺脚的地方穿越马路。十字或丁字路口都设有岗亭，红绿灯是由里面的交通警察手控的。繁华地段的路口中央设有安全岛，警察站在上面用红白相间的指挥棒加手势指挥交通。这样的场景，搬到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而当年这种“原始”条件下的交通状况，却远有序于现在，原因很简单——车少。

有报道说，截至几年前的2003年9月，国产轿车的款型已达115个，每年仍在以几十款的速度陡增。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街上跑的汽车，常见的和不常见的相加，品种和车型都数得过来。

以小轿车为例，街上能见到的有吉斯、奔驰（当时称奔斯）、吉姆、雪佛莱、别克、道奇、斯克达、伏尔加、华沙、胜利20、丰田（以上为进口车），红旗、东方红、上海（以上为国产车）等一二十种牌子。当中的一款吉斯牌卧车，据说是苏联领导人送给中国领导人的，数顶级车，总共没几辆，毛泽东、郭沫若各有一辆，北京市民难得一睹。奔驰车可以见到，但奔驰

北京最早的立交桥——复兴门立交桥，竣工于1974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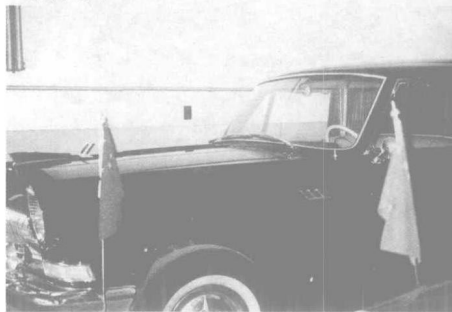


600型，据说国内只有两辆，陈毅坐一辆，“文革”时转由黄永胜坐；另一辆被拆改成仿“红旗”车。高级干部乘坐的卧车，大体前期是吉姆，后期是红旗。其他几种，伏尔加、华沙、胜利20，是马路上常见的中低档进口车，但里面坐的是谁，也不可以“车”取人，刘少奇的子女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有这样的记述：“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爸爸去谈话。”有照片可证，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乘坐的也不过是一辆最普通的敞篷吉普车。众所周知，1966年春夏之间，毛泽东在湖南老家的滴水洞住了一些日子，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坐的是吉姆车。国产车以上海牌居多，红旗车又有“一面”、“三面”之分，只有国家领导人和军队中总部、军兵种及地方省部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资格坐。因而一般市民在街上看见一辆“红旗”，就会对乘坐者下意识地作“大人物”的泛想，其实未必，里面很可能坐的是秘书、厨师、警卫员或服务人员。

其他车种，如大轿车、卡车、吉普车、摩托车的牌子，则差不多是屈指可数了。

汽车的品种少，数量也少，少到什么程度呢？侯京泉是我中学时的邻居和同学，当年属于经常坐在西长安街南礼士路一段的马路牙子上看汽车的一族，他有一年春节来串门，提到这些事时说，那时一个小时，也就过个二十来辆车。这个数字未免有点夸张，但并不离谱。赵忠祥在他的一本回忆录中也这样说：“我那条胡同一年也未准过一辆小轿车。”前几年，一位在天安门广场站过岗的退休交警在电视台做节目，他的记忆是，一个夜班值下来，所过的汽车，也就三五辆。当年，北京市私家车的拥有量几乎等于零。出租车数量尚不及现在的零头甚至零头的零头，没有“扫马路”一说，也没有“趴活”一说。1973年以前，首都汽车公司是北京市惟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车数不及千辆，城区设有

红旗牌轿车



吉姆牌轿车



二十来个出租车站点，以华沙车居多。谁家有急事，须打电话或直接到站叫车，类似于现在急救车的运作方式。1976年4月9日上午，叶圣陶和家人到首都体育馆看广州杂技团演出，他在日记里说：“乘十三路汽车尚容易，抵平安里则待之甚久始获挤上五路电车。车中几无法站直，抵体育馆，颇为吃力。而杂技已上演半小时矣。”归途不堪再挤公共汽车，他们步行到动物园，在那里的出租车站打了一辆车，“径直抵家，与去时之难易判若天渊”。从动物园到其东四八条寓所，花费2.25元。公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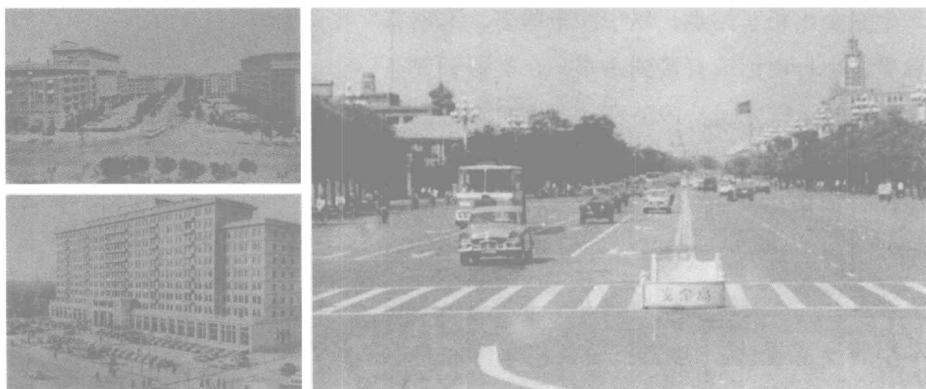


张闻天用过的月票

数量和用途，也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那时，国务院下属的机关，副部长级公务员，很多不配专车，有些部委是两三个负责人同乘一辆吉姆车上下班，更少有公车私用的现象。上述叶圣陶的事例，即是一证，他当时不仅是高龄的知名人士，还是一位部长级官员。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过被公共汽车门夹住，摔断了腿的遭遇。公共汽车和自行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各个阶层的市民都不免经常利用的交通工具，许多今天听起来相当显赫的人物，在回忆文字里，曾留下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的记录。因而街上跑的车，还是以公共汽车为最多见，路线也不过几十条，其中市区汽车有28条线（不含支线），电车13条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北京市民大体生活在两类环境中。一类是城里的胡同，另一类是城外的大院。

胡同作为京城传统的居住环境，遍布于老城区，大致也就是今天的二环路以里，总计有一千多条。以前由于全市的人都扎在城里，倘要细究，胡同与胡同，胡同里的院子与院子，院子里的屋子与屋子以及屋子里的住户之间，高低优劣，是参差不齐的。早年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一说，也不尽然。但共性依然是主流，各个行业的传统市民（即所谓“老北京”），在那里的大杂院或四合院中住了几辈子，政权的更迭并没有使他们的居住状况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是胡同住户中的主体。解放后，一些领导人、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及一些机关的宿舍，也安在胡同里，这应该是另当别论的，前者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后者也颇具“组织”色彩，邻里之间，味道已变。他们不属于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街区，车少楼也少。

能体现市井京味的胡同居民。例如东城著名的总部胡同，以前多为大宅门，解放后被许多单位“瓜分”，成为职工宿舍。这条胡同的55号就住进去百十来户，成为人民美术印刷厂的宿舍院。其他当宿舍院的还有：53号，人民出版社宿舍；51号，中央美院宿舍；78号，外贸部宿舍；74号，公安部宿舍；72号，市公安局宿舍。这条胡同由于住过不少画家、作家之类的文化名人，后来曾被一些市场类报纸反复追踪和报道。

关于胡同和胡同里的故事，有不下上百种专题作品面世，已经不新鲜了。值得一说的是，六七十年代，正值一个地覆天翻的动荡岁月，胡同里的变迁，也是难免的。例如，不少胡同的名称，一度被“革命”化了。1967年版的《北京地图》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迅速涤荡旧社会在北京街巷名称上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使首都的街名、地名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面貌，本地图所用的新街名，都经有关部门根据广大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倡议，研究决定。”被重新命名的马路不胜枚举，几乎覆盖了北京所有的街道，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张自忠路改为工农兵大街，安定门内大街改为大跃进路，东四南大街改为瑞金路，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南北池子大街改为葵花向阳路，德胜门内大街改为人民公社路，复兴路改为解放军路，西直门大街改为集体化街，虎坊路改为古田路，三里河路改为革命友谊路，马家堡路改为秋收起义路，白石桥路干脆就改成了文革路……大街易名，小巷自然要跟着变，如东四北大街改为红日路后，东四头条即改为红日路头条，其他依次类推。更有甚者，红小兵胡同、学毛著胡同、灭资胡同、反修胡同等等，都赫然出现在这张地图上。今天的读者也许听着好笑，但在当年，就北京市民

的心态而言，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又例如，随着“兴无灭资”的口号被贯彻，大量私房充公，不知多少标准或规整的独门独院沦为杂院，不仅住户杂了，而且还大兴土木，格局与从前相比，面目全非。学者王世襄是文化世家出身，其父曾任中国政府派驻英国的监学，母亲是画家，解放后，他一直安居在父辈留下来的一所清幽的院子里。前几年，我陪着一位喜欢收藏的朋友，到日坛公园附近的一座住宅楼里采访过他，谈话间，他提起，“文革”以后，为了不致使外人掺进，他曾邀朋友黄苗子夫妇等暂居其院，但也未能撑住多少时候。这个院子最终“沦陷”，塞满了各色人户。搭小棚的，铁皮匠作业的，喧闹声震耳不绝，“简直就没法儿住了”。类似王世襄这样境遇的社会名流或普通市民，是比比可见的，我周围就有不少熟人的家与王先生大同小异。以致“文革”结束后，引发无数起落实房屋政策的官司，有些至今未了。

大院是那个年代的一个视点。1949年以后，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重返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置，相应的机构随之蜂起，作为这些机构的宿舍，大院的出现，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自50年代起，北京的城市建设呈放射状拓延的趋势，大院多建在城外四周。军队、高等院校、大型科研机构和企业宿舍院，往往随着单位走，与机构是一体的；国家机关的宿舍院多数是分散的，经常是东一处西一处，如轻工业部宿舍，月坛公园对面有一个院子，右安门内大街路东有一个院子，和平里地区也有一处。其他部委，大体类似。这些院子里的宿舍楼，多为二、三、四层。60年代初，煤炭部曾在永安里南侧盖过两三栋九层高的宿舍楼，应该是那个年月居民楼中仅有的高层建筑，现在还在。70年代中期，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复兴门一带盖了一座12层的预制板宿舍楼，号称“十二层楼”，远近闻名，因为这是北京（恐怕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栋接

当年的四合院即使“幸存”下来，
如今也都走了样。



干面胡同一处带门廊的晚清“豪宅”，
从前的气派依稀可见。



近今天意义上的高层建筑，马季等人是第一批住户，弄不好，他们也是全国第一拨高层建筑的住户。当时的宿舍楼多为砖墙结构，外观无非红灰两色，有坡顶的，也有平顶的。宿舍跟着机构走的院子，有院墙与大街小巷隔着；专门的宿舍区，有院墙的似乎不占多数。无论有无院墙，一概以“院”相称。“我们院”、“咱院”、“后院”，是北京城外的孩子的口头语。前不久，当年和现在的一个邻居来电话，还这样问：“院里如何？”我理解，他指的应该是我们两家都已迁出二十来年的那所没有院墙的院子。

从分布上看，复兴路上公主坟到玉泉路沿线，是军队大院相对集中的地带。玉泉路路北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路南有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等五六家军队大院。复兴路南侧的另一条路上，还散落着五六处军队所属的院子。高校大院则相对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顾名思义的学院路，是一条坐落在西直门外的南北走向的马路。自南向北，路东依次为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路西依次为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这就是学院路上有名的“八大学院”，当年的 31 路郊区公共汽车线（西直门—颐和园）贯穿于这条马路。“文革”中，除钢院外，这些学校全部迁离北京，钢院也已经在云南踩好点，据说是周恩来的一句话，把它留了下来。那时的学院路，一度名存实亡。其他一些院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工业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排列在学院路西侧、与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

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从西便门到阜城门以西，推进到木樨地、三里河、百万庄一带，就分布着国务院、华北局、中央机要局、广播事业局、全总、轻工业部、新华社、公安部、中央政法干校、铁道部、国

建于 60 年代初的永安里煤炭部宿舍楼（九层），这是 70 年代以前北京市最高的宿舍楼。



月坛地区地藏庵一栋建于解放初期的四层“原装”坡顶宿舍楼。

